第一章

疾病战胜了恶魔

自 1492 年起的 400 年间，美洲大陆的土著人口从 1 亿 1200 万锐减到大约 560 万[1]。1519 年墨西哥的人口有 2910 万，而 1605 年时已不足 100 万人[2]。仅就北美地区而言，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期人口总数为 1800 万，而截止 1900 年仅有 25 至 30 万印第安后裔幸存下来。

与人们普遍相信的看法不同，美洲印第安人内部的战争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并不多见，也并非是这场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最庞大

此章不应被视作是对首批到达美洲土地的欧洲移民进行宽恕的一次尝试。他们对土著民族犯下了种种肉体上、道义上和精神上的罪行，其中的一些至今仍在这块大陆上仅存的“野蛮”地带肆虐着。这里要表达的关键意思在于，若非这些新来的欧洲人带来了尽管也危及了自身的病菌，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土著民族本该有机会适应这一意识形态和政治震荡，它所能造成的破坏也就不至于那么严重了。另外，这样一种假设也对欧洲人到达“新世界”的动机提出了疑问；因为，如果欧洲人不是与自然界的生命力量分隔过于久远，他们大概本不该染上最终导致其离开故土的病菌。

的人口缩减的原因,而恰恰是它的结果。这场‘美洲大灾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新来的人带来的传染病[3]。美洲人口统计学家伍德罗·博拉 1964 年写道:“‘新世界’的人们以及其后大洋洲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一种完全或接近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在短短几十年里承受了疾病造成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本该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他们在极短时期内遭受了一系列打击,这些后果对欧洲和远东来说需要几千年才能消化得完[4]。”

到 1992 年,北美洲所经历的对人类、动物、植物的数量及其自然地貌持续不断的破坏就要满 500 年了。500 年来,那些携带了病菌的人和那些几乎被病菌毁灭殆尽的人们都在为此而受审。据我所知,那些病菌却从未受到审判,然而这样一个一举两得的审判过程,效果可能是极好的。

首先,就生态意识而言,人类正在寻求建立一种研究机制,去了解为什么如此丰富的一个细菌文化存在于两个世界中的一个,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却踪迹全无。这一研究成果可以使我们重新找到规范人与自然健康关系的法则。它还可以在人们忘记这些法则时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破裂的原因(和结果)。通过研究美洲的精神实质,也使我们学到一种对生命和宇宙全新的观念。

其次,就寻找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而言,让细菌而不是它的携带者受审,对于除去只不过是这些病原体牺牲品的人们所负有的罪责是大有裨益的。自从一开始接触,病菌携带者和被感染者便都苦于无法认清谁是他们所陷入的巨大灾难的元凶;也无法认识到这种局面,不仅会使犯罪方受到起诉,而且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共同为人类思想的转变做出努力。直到目前,生态政治的推断尚不完整,这是由于可能具有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的地球居民——“新大陆土著人”——仍一贯地被排除在外。我们必须紧密依靠人类团结的力量,与那些曾使“旧世界”居民变成罪犯,又让‘新世界’居民成

为牺牲品的病菌做斗争。既然人类从逻辑上——进而从社会意义上讲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统一体，那么如果我们准备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开始反思是什么造成并仍在导致社会和生态状况的退化。这一问题对“旧世界”和欧裔美洲人来说特别严重，而在“新世界”的文明中却显然没有存在的迹象。因为我们都有力量和义务来帮助我们的人类同胞们生存下去，所以研究创造性的美洲哲学可以将那些有心人置于即将到来的社会科学重大发现的前沿。让我们简要谈谈在这一历史预见的倡导下，进行解脱罪责工作的过程。

美洲印第安人总是讲，为了达到理智，一个人必须以幽默和尊重来面对情感。为了赢得某人的信任和合作，或者安抚他人以使他们参与一个共同目标的实现，“很有必要首先(与这些人)进行感情交流，振作起精神才能(一起)坐下来(把事情)考虑清楚[5]。”东北地区的土著人，尤其是温达特*——易洛魁人在演说或谈判开始时，几乎毫无例外地(互相)送上几串贝壳串珠，这种做法意在“让理智归位[6]。”

500 年来，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只是时不时地交流一下感情，而且往往是敷衍塞责。强权政府所确定的社会利益从未允许他们做出更大的努力。分割就是铁一样地统治方法，因而在过去，通过灌输负罪感或是优越感、预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制造和保持头脑混乱来说就是十分必要的。

当牺牲品变成了罪犯

在美洲印第安人内部以及他们与欧裔美洲人之间，曾经策动

温达特(Wendat；Wyandot)是休伦易洛魁人和伊利易洛魁人投靠威斯康辛阿尔衮琴人之后的称呼。——译者注

过数次战争，这些冲突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掩盖了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口缩减的灾难。人们不是去描述病原体让我们陷入的绝境，以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和解，而是借助于讲述印第安人，特别是易洛魁人,每年灭绝多少个其它印第安民族,来证明(白人)夺取土地的正确性。保罗·拉格诺神父在 1649 年的《关系》一书中写道：

我们沿着大约 900 海里长的航线行进着，在敌人的家园里时刻都要提高警惕，——无论在哪儿，易洛魁人都是最可怕的，到处都是他们残暴的印证、或是奸诈的形迹。在航线一侧我们过去考察过的一个地区,我记得 10 年前大概有 8000 到 1 万人。而今,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岸边，但后来海岸上洒满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鲜血……天哪，那些邪恶的易洛魁人怎么可以把所有这些地区都变成废墟……我们唯一的慰籍是，基督徒的性命可以换取他们成为真正上帝子民的资格[7]。

然而白人和红皮肤的这类人都很清楚，印第安美洲人人口的迅速灭绝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1640 年耶稣会会士杰罗姆·拉勒芒写道：

他们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秘密研究一下这疾病了（因为他们相信它是个魔鬼），只有我们自己仍然健康并充满活力，可我们持续不断地呼吸到的只是受到（病菌）污染的空气,——整天呆在臭气熏天的病人们的身旁，每个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我们无疑是遇上了麻烦，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驻足，死亡和疾病都与我们形影相随……

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这些可怜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一切的发生太频繁了，人们上百次地提到，我们在哪儿最受欢迎，在哪儿施洗礼最多，事实上那里的人便死得最多；相反，哪儿的小屋拒绝我们进入，尽管那里的人有时也会病入膏育，但过些日子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又都活蹦乱跳地痊愈了。

这位善良的牧师又写道，感谢神圣的天意照示于这些疾病之中：“我们将在天国里见到这秘密，但会更加崇拜上帝在其中做出的审判[8]。”

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耶稣会会士和其他一些人也成了他们无意间帮助传入的病原体的牺牲品，他们这种天真的态度是一种对肉体与精神平衡法则无所顾忌的文明的产物。是疾病而不是传教士战胜了恶魔，美洲印第安人——创世的崇拜者——成了这恶魔粗暴而快乐的奴隶。

来自克拉玛斯族*的印第安人“升起的红太阳”1976年写道：“罪孽被正确地诠释为违反了自然法则，因而，人类暴露在自然界的破坏力之下,或者也可称之为‘撒旦’,一大批可以致命的疾病以折磨人的形式接踵而至。北美土著民族无辜地受到白人违反自然法则所导致的灾祸的折磨，这便是我们回顾近代北美洲历史时要面对的残酷事实[9]。”

结 论

这一历史观念使以往受到压抑的情感得以松驰成为可能。那种受到抑制的情感阻止了各文化中的人们表达同情和尊重，只是培植了负罪感和仇恨，并让每个人无法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

当贝壳串珠被赠与所有为历史所触及的人们——赠与了全人类——要么擦去了挡住他们视线的泪水，使他们的呼吸变得平稳、耳朵恢复了聪敏，要么为相互会面铺平了道路，直到美好的生活照亮了每个人的眼睛,理智在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归复原位”,这时我们便能认真听取并理解美洲印第安人自述史了。

*克拉玛斯(Klamath)西南俄勒冈印第安部族名，由于居住在克拉玛斯湖北部,亦称‘湖上人”。——译者注

第二章

神圣生命圈

按照苏族*圣贤海哈卡·萨帕的说法，凡印第安人所为，皆以环形方式完成。这是因为宇宙天体运行均依据环形轨道，同时万物形态无不趋近圆形：

古时候，我们是一个强大、幸福的民族，所有力量都来自我们民族的神圣圈。只要这个圈保持完整，人民就能繁荣昌盛。鲜花盛开的树木是圆圈的生命中心。圈的四个方位向它供应养分。东方给予和平与光明，南方送来温暖，西方带来雨水，北方伴着它的寒冷和强风奉上力量和韧性。外部世界(超验世界、宇宙)向我们传递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也就产生出我们的宗教。宇宙力量所完

* 苏族(Sioux)，亦称达科他人(Dakota；Nakota；Lakota)是居住在加拿大南部、美国北部的印第安人，主要由桑蒂(Santee)、坦顿(Tenton)、东达科他(Eastern Dakota)和扬克顿(Yankton)四个部落组成，性格剽悍、英勇善战。——译者注

成的每一项业绩均以圆圈形式出现。天空是环形的，我听说地球也像球一样圆，星球也是圆的。风在刮到最强劲的时候就会打旋。鸟筑巢时也采用环形，因为它们和我们有着相同的宗教……我们的帐篷*小屋就像鸟巢那样，也是环形的，并总是呈环状分布——这是民族之环，一个由许多小巢筑就的大巢；伟大的精灵'指引我们到这里来养育我们的子孙[1]。

在神圣生命圈中，一切生灵，物质的或是非物质的，都是平等和相互依存的，这一观念贯穿于美洲印第安人对生命和宇宙的整个认识之中。

每一种生命形式，物质的或非物质的，都要求美洲印第安人加以尊重，并且要自觉地认识一种秩序，对人类头脑来说这秩序虽不可理解，但它却是无限完美的。这种秩序被称做'伟大的奥秘'。对于传统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只要以含蓄和崇拜的情感去认识构成神圣生命圈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它们扮演的角色及其各自的力量，生命就找到了自身的意义。美洲印第安人的天性就是尽力尊重存在于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的神圣特性。

就人类关系而论，美洲印第安人亦持同样观点：所有的人都是神圣的，因为他们都是'伟大奥秘'意志的体现。这样我们大家就都具备了自己的神圣见解，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中必须找到的一种独特力量，这种力量使'伟大精灵'的见解得以实现，而我们自己仅仅是'伟大精灵'的表现形式。因此，每个男人和女人都通过同宇宙"伟大力量"的独特关系找到了他或她个人的重要性。在一个有组织的思想体系里，如果个人处于从属地位，宗教或政治意识形态就没有为人类和物质利益服务的余地。一位奥吉布韦族医师对他的传统深怀敬意，他简单明了地指出："一个人的责任就是

帐篷(Tepee；Teepee)是美洲印第安人用树皮、兽皮等制成的圆锥形帐篷，Tepee(tipi)来自达科他语，意为居住的地方。——译者注

为伟大的精灵而工作[2]”。

人类有义务去发掘他们自身的见解，自身的价值，自身的宗教；妇女由于具有特殊的自我净化能力，因而比男人更容易认识自己的见解。由于认识到人类必须帮助维护所有生命之间的神圣关系，“新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指令自己奉行一种哲学，即决不让其它生命的存在和生存，特别是动植物的存在和生存受到威胁。他们承认和遵守法规，决不危害其它生物的自由。这样也就确保了他们最珍贵的财富，这就是他们自身的自由。多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独立靠得是他们有能力取得无比丰富的食物。亨利·多宾斯提供了一份有关佛罗里达大西洋沿岸土著人和食物来源的令人吃惊的细微描述，勾画出他所说的“土著美洲人失去的乐园[3]”。

美洲印第安人原本居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那里每个人的精神特性得到承认和尊重。对于一个行将进入成年期的男子来说，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莫过于解开他自己精髓之谜——也就是他的见解之谜——这通常要借助于适当的演绎和祭典仪式。奥吉布韦族人种学家巴兹尔·约翰斯顿阐述了有关土著美洲人探求和取得见解的重大意义。

> 创造，具体说就是完成基奇·曼尼托*(伟大的力量)的见解……每个存在物，无论是植物、动物或是岩石都是自然的合成物(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而基奇·曼尼托仅对世间男女赋予取得见解的资格；只有男人被责令对见解进行探求，并且能熬过它的考验。……见解能提供强大的自我理解感和对命运的了解；它还产生独特的价值感和个人自由理念。见解，当它确实到来之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灵魂的成熟的表现。由于它来自个人的

*基奇·曼尼托(Kitche Manitou)在阿尔衮琴语中意为“伟大的神灵”或“伟大的力量”。“Kitche”=“Great”；“Manitou”=“Spirit”或“Power”。——译者注

> 努力和造物主的恩典，其它任何人对它都无法参与。不存在对见解探求的干涉……见解，当它确实到来之际，它标记着探求的高峰和一个新的生命形式的开始…… 在道德范畴内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所做所为不再是孤立的缺乏意义的行为。对于生活来说，有了行动目标；即完成见解的意义。“得不到见解非好汉”这句格言对他不再有用了。随着见解的到来，存在有了生气……由见解规定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正是通过这种模式人类获得了完美、尊严、和平、忠贞和智慧〔4〕。

在神圣生命圈里，虽然人类负有特殊责任，但同其它生物仍处于平等位置。神圣生命圈分四个方位。在美洲“四”是个神圣的数字。世上有四个神圣的方向，四种神圣的颜色，四种人种，每个人种都有自己的见解，还有人生四个阶段（少年、成年、老年，然后又返老还童）。一年有四季，一天有四个时辰，这些都是神圣的。因此生命圈运行于四种运动的大循环之中。

美洲印第安宗教主持人举行神圣祭典仪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净化和涤罪。他们同所有那些时辰和运动对话，当他们完成了整个大循环之后便说上一句“；凡苍莽大地皆同我攸攸相关”，这样就确识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共同的和平见解。

美洲印第安人历史的独创性

美洲以外的大陆都是相联的（澳大利亚除外），而美洲大陆从外形上看独立于世界之外。旧大陆的各民族总是以相对共生的方式进行演进，他们几乎以各种方式（经济的、文化的、生物的等等）相互影响。反之，在同欧洲进行正式接触之前“，新世界”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因而有办法保存有自身特色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来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和观念同激励和推动欧洲人以及随他们来到美洲的其它民族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截

然相反。1868 年人种学家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写道“:由于他〔美洲土著人〕从来没经历过那些血缘上和文化上的交合——这种交合总的说来调节和推动了旧大陆的各民族的增长——他以自己的方式拟定了自己的命运。而他所得到的是超过一般意义的所有权[5]。”

该作者还指出，在那几千年同外界影响隔绝的年代里，美洲大陆变成了令人惊讶的近亲语言“地区”。

> 从“冰冻(北冰)洋”到“火烧地”,土著方言虽然用词有所不同，但其结构特点是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它同我们的语言（英语）差别如此之大，以致难以对其进行阐述。语言学家称其为多词素综合型语言…。这种语言寻求以最深入的形式将所有的关系词和修饰词同主要观念联系在一起。它通过改变不同词的自身形式，将它们熔合在一个词之中，并排除其它任何外围概念[6]。

拉瓦尔大学语言学家皮埃尔·马丁认为这种突出的特性仍为现代语言学家所承认。

它似乎揭示了所有土著美洲文化的普遍存在；进而帮助说明美洲哲学的根本一致性，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在美洲没有宗教和经济大战。对美洲印地安人来说生命是环形的，生命圈产生生物的能量。生命只不过是众多生物关系间的一个大链条。人类仅能获取疏导和传播能量（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权利。皮埃尔·克拉斯特里斯在他写的《同国家对抗的社会》中报导了弗朗西斯·赫克斯科在南美印第安人那里观察到的现象：“首领的角色就是要慷慨大方，并且有求必应。在有些印第安部落里，人们都承认首领财产少于众人的财产,并且衣着打扮最寒酸。多余财产均以礼物形式献出。”克拉斯特里斯继续写道“: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所叙述的纳

姆比克瓦拉人*的情况亦完全雷同……没有必要再举更多的例证，印第安人和首领的关系在整个大陆都是一致的。贪婪和权利都是不可容忍的 要当首领,你就必须慷慨大方。”[7]

美洲印第安人对生命和生物的互补特性崇敬之至，因为生命都是“伟大奥秘”的表现形式。他们绝不想断言自身比其它生物更优越。他们甚至不曾驯化动物，因为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灵感和自由。美洲印第安人也不进行盘剥。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进尔观察到“由于生活简易，整个美洲不存在放牧生活，没有任何得力证据说明有过放牧民族，没有为了挤奶而驯养的动物，也很少有为了食肉而驯养的动物。”[8]

特有的美洲生态约束

当然，美洲印第安人不会由于他们大陆的经历而受到称赞。文明只不过是地球命运在一系列演变后的产物，我们共同的栖息地的塑造受到了气候和地理的制约（如相互间的接近程度或隔绝状态）。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人类社会进化的起源时，往往将群居解释为社会的原始形态。但是对这一演变阶段的浮浅描写显示出现代人早已忘记了智力手段和精神手段的概念。本来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概念保存一个有关他们的过去和他们自身人性的有尊严的形象。更有甚者，由于受到有关物质进化虚伪说教的蒙蔽,他们一直不能理解的是 他们在所‘发现’的美洲所遇到的精神遗产是一种他们自己在“旧大陆”的某一时期本应保存的一笔精神遗产。他们失去了这笔遗产是由于受到了导致他们目前这种文明类型的约束。

而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当他们发现白种人在他们大陆上

纳姆比克瓦拉(Nambikwara)是南美洲一个部落名。——译者注

——“海龟背上的伟大岛屿”[*]——上失落时，他们就更充分地占有了前面提到的精神礼物。根据伟大生命圈的运行规律，财产和财富都自由分发。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因为美洲印第安人的道德观比欧洲人的道德观更伟大。还因为自然背景——美洲独特的地貌制约。

于是，所有第一手资料都表明，1492 年当那些饥饿的、受到惊吓的、褊狭的人们登陆之际，他们得到的是尊重和人道。他们发现此地充满和谐、自由和宽容，以致众多人离开旧大陆家园来到美洲新大陆。

印第安人虽然严重受到那些灰色来客带来的战争和疾病的威胁，但他们相信生存只有“生命主宰”进行安排，而没有对厄运予以反抗。他们只有在极其必要时才进行自卫。印第安人对“战争艺术”虽说无知，但对和平艺术却无限通晓。他们义无返顾地、慷慨地承担起“将白人美洲化”的任务，[9]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帮助这个新生儿发掘他们刚刚找到的“母亲大地”的精髓和原始智慧而不遗余力。

美洲印第安人关于创世的见解

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崇敬“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奥秘”、“伟大的力量”、“至尊的上苍”、“生命的主宰”，印第安人称他们为“父亲”或“祖父”，并非想将造物主男性化，而是要提供一种最强有力的创造力和保护力，亦即万物和通力之源泉。

更具体地说，所有美洲印第安人都把地球称作他们的母亲。地球同他们自身一样，由身体、头脑和灵魂组成。支配地球的灵魂和

[*] 海龟背上的伟大岛屿（The Great Island on the Turtle's Back），根据印第安传说，温达特人认为地球是一位来自天国名叫安坦茨克的妇女所创造。“伟大的海龟”将她驮到背上，并命令其它动物从海底挖土洒向四方，这位妇女连同她刚生下的两个儿子就为人类建造了“大地”。——译者注

物质生命都是阴柔性的。温达特人认为地球是一位来自天国名叫安坦茨克的妇女的创造的;“伟大海龟”将她驮到背上,并命令动物们从海底挖出少量土壤来,向周围泼洒。这位妇女连同她刚生下的两个儿子就为人类建造并安排了“大地”。这两个儿子竟相提出他们个人对人类生活模式的见解:一个好心地认为人类生活应当舒适,而另一个则为生活设置障碍和危险。于是这位母亲进行了平衡,使得人类世界变得像目前这样一块美丽有序的地方,但也是个有着严峻考验的地方。这种考验是人类生存的部分条件,它鼓励同情和怜悯,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一项根本尺度。

美洲印第安人认为,妇女代表理智。她们能教育男人,指导未来和预测社会需求。男人承认女人身上存在着生命的原始力量和了解其法则的能力。就社会的组织和导向来说,赋予女人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要比男人来的优越。这在女族长制的美洲印第安社会中是再明显不过了,但在所谓“父系社会”包括大多数游牧社会里同样也是真实的。在建立反映家长制机构时上述优势又必须遵守父子相传的顺序——这是由于在寻找性命攸关的物质和精神必需品方面男人扮演着优越的角色——但这绝非是真正的父系社会的特征,而只是说明存在一种阳刚力量的外向型表现而已。(由于人类生长在地球上)对生活必需品的直接依赖,加强了他们同地球的接近感。可以认为,美洲游牧民族的大多数在对世界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概念方面的认识上都是母权社会的。

游牧民族的文化同温达特一易洛魁文化不同。温达特一易洛魁文化具有自身的农业和贸易力量,而游牧社会的成员不得不停留在一个同地球和它的子孙们——动物、植物等的更纯洁、亲密和谐的关系上。游牧民族比半定居的民族同他们母亲——地球的联系更紧密。他们的文化以轻柔为中心,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需要一个最理想的和谐。他们的高度复杂的意识形态对宇宙的力量更敏感。他们同其它接近自然的人们一样,聪敏、爱好和平,但是表现的

更加典型化。

母权制社会

约翰·雅洛比·巴霍芬曾经描写过女族长制，或如他所说的“女人当政”。他认为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如果有所背离则会产生失衡：“我们前面讲过‘女人当政’犹如历史的诗篇，我们可以认为它代表了一个直观世俗及宗教萌发的阶段。这是个虔敬的时代，迷信的时代，聪明中庸的时代和公正的时代。由同一原则萌生的这些品质都毫无例外的，以惊人的一致性产生于女人当政的民族。这要归因于他们的古代先人。[10]

由于包容于伟大生命圈之中，美洲印第安社会很少是以父亲为中心的。为了支持史前印第安人流行母系社会的论点，某些作者试图在流行病使人口骤减后在同化过程和母系制的侵蚀之间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历史学家谢泼德·克雷奇三世争辩说：

> 来自北阿萨巴斯克以外的比较数据暗示，在同化压力强度和两代人之间母系传代原则消失之间有着相当精确的联系。由婚后新居住地代替婚后在女方居住的现象也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一个社会里被同化程度深的成员比被同化较浅的成员可能更会放弃有利于世代母系社会的各种活动、母系社会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被同化较深的成员可能对传统活动不感兴趣。[11]

巴霍芬写道：在母权社会里，在父权社会的胜利破坏了群众的均质性，并且用前后一致分类代替了混乱的千篇一律以前“所有男人都被视为兄弟，所有妇女都被视为姐妹。当时自由和平等是所谓母权社会文明的典型特征；同样的，对陌生人善报并防止任何形式的限制亦是当时的社会特征。[12]

按美洲印第安母权社会论者的观点，父系演变理论，无论它是

经过怎样的提炼或理智化，大不了也就是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我们称之为“男子中心论”的辩解。它原本是在一个对自然的错误的观念下定义的，这种观念将男人置于创造中心的位置而忽略了非人类生命(主要是非阳刚物),在同生命平衡的关系中,他们都是特殊的灵性和均等物。

今日妇女渴望找回“她们昔日不屈不挠的影响力并能再发现通向大自然的真正路径，而抛弃那虚假的，传统的带存男人标记货色。”[13] 此妇女可在美洲印第安妇女身上找到她最有力的灵感。正是一位耶稣会会士，拉菲陶神父，当他观察构成易洛魁社会基础的母系中心机制时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民主美洲思想的核心。这种核心代表了美洲印第安社会的显著的社会均衡的关键。在 1724 年说到易洛魁妇女时他说道：

> “再没有比妇女的优越性更真实的东西了 。是她们维系着部落的存在、血统的高尚、家谱树的代序以及家族的延续。在她们身上体现着所有真正的权威：土地、田野和所有属于她们的收成；她们是议会的灵魂，和平和战争的仲裁人；她们管理税收和公共财富；奴仆托付她们管理；婚嫁由她们安排，儿童由她们管教；继承顺序建立在她们的血统上。而男人正好相反，完全处于孤立位置，自己管自己的状态 。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来说都是些陌生人。[14]

在有关欧洲和美洲印第安人妇女法的不同观念方面，这位到休伦和易洛魁地区的传教士注意到，在这两个民族里，男人必须向他要娶之为妻的女方家提供一大批礼物。

丈夫向女方家提交的礼物是真正由他购买的精品，也是联姻的法宝。

> 不同的是（同罗马人礼习俗的区别），这里是丈夫提供财礼，而在罗马人那里则由妻子提供，通常是交付三枚特制的硬币，做

> 为财礼的象征。这些差别的道理是，对咱们印第安人来说，妻子是家庭主妇，不走出她们自己的家园，而对罗马人来说，她们走进丈夫管辖区，因而他们不得不购买进入一个家庭当母亲的权利。[15]

在母系中心社会中对待妇女地位问题上的差别反映在了对埋藏在“母系大地”中的人类手足之情的认定。非土著作家至今仍时常忽视这种基本文化差异。反之，他们总是倾向于将美洲印第安社会，特别是守猎社会描绘为更为堂皇的男人统治的社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巴霍芬进一步阐述他关于母系社会的理论，同以严酷和道德混乱为特点的父系社会相比，母系社会则显示出她的有序、温柔和宽厚。

> 对具有繁殖性能的母道的崇敬屈从于性欢快。性行为对男人来说是为了乐趣，而对女人来说是通过忍耐而承担的神圣的传宗接代责任。在她的势力范围内，保存种属繁衍一直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是由一种由贞洁作为必要条件的道德力量强加给她的。男人可以放荡不羁，自行其事，而且将这种无节制视为自然法则以满足其私欲，这种兽性的强制感由于他们更强有力的肌肉而加强了 。性行为的这种矛盾的两重性是不容置疑的。在当今人们的言行中还是非常明显的。男人支配地位慢慢地注入了我们的文明之中和腐蚀、吸干生命源泉的腐败的道德观之中，从而将幸福降低到最低下快乐的形式。阳性座右铭仍然是：战争和情欲，阴性座右铭则为：节制力和和平。[16]

美洲印第安妇女的“高位”并非像某些作家所说的“是出自对部落经济组织的控制[17]”。母权中心论者认为在这些社会里妇女“高位”是来自对妇女天资的充分认识，这种认识注入到她所教育的男人，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必须懂得去维系生命核心存在关系的社会及人类美德。朱迪思 K·布朗常说，妇女不会通过她们掌握的

“力量”去控制任何事物，她们通过“天地万物（造物主）”按自然法则和自然直觉来行事。巴霍芬观察到，男人不具备教育的天资：“女人正是通过对子女的养育，而不是男人，学会了如何超越自私的狭隘界限，展示对其它生命的牵挂，努力保留和肯定其它生命的存在。”[18]

当男人处于支配地位时——这本身就背离于自然——男人只能选择物质财富，因为他缺少妇女对生命价值的亲昵了解。他将能力建立在兽力基础上。但是妇女自然地选择和平和稳定，她的力量是建基于对内部力量教育的基础之上（对于见解的探求）。妇女的考虑是长远的，出自对人性的关心；男人的考虑是短暂的，是由个人或民族骄傲引发的。

属于母权社会的自然人，将他的种子托付给妇女，由妇女对其进行怀胎、滋养和教育，男人用善良、人道和感恩来喜悦地执行保护者的角色。长时期以来，女权社会的一大部分精神负担是“地球”——一位妇女——她处在男性统治和支配之下。

当地球遭到现代人的攻击时，迪思族圣贤乔治亚娜·托巴托一针见血地指出：“每当白人来到北方或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并开始撕裂大地时，我感到好像他们在切割我身上的肉；这就是我们对土地的看法。它是我们的血肉。”[19]

结　论

15 和 16 世纪的欧洲人所出身的社会，如果不是把压迫作为一种规则，也一定是把它当作了准则，他们来到美洲，发现了土地、村庄、乡镇和城市。所有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它们的组织方式尊重了由各个环节生命组成的循环链，特别是尊重了与四大宇宙方位相对应的四大元素。尽管这些土著民族无法避免人类本性所特有的意见不一、利益冲突或武装对抗，他们中也没有人试图利用